

陶渊明出仕期间人生理想的演变

□ 刘 周

内容摘要:陶渊明几番出仕入仕之后,坚定了归隐的立场。这中间陶渊明的人生追求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最早应该具有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而出仕的,但是身处乱世,眼看不可能施展抱负之后他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屡次出入仕途,最终因目睹军阀混战,性命难保,为求自由和保身,决意隐居。

关键词:陶渊明 出仕期间 人生追求 演变

陶渊明是古代真心隐逸且隐于人境的大隐。后代多仰慕其风,乐道其韵。其实,仔细阅读陶渊明集,品味其作品,我们可以发现陶渊明的人生追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他出仕后,人生追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经历丰富在不断转变,最后坚定了自己躬耕田亩的志向。梳理这个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陶渊明的彻底隐居。

陶渊明早期家境不算富裕,但是作为东晋长沙郡公陶侃的后代,基本生活还算稳定而富足的。加上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熏陶,所以早年出仕的原因主要还不是为了经济,而是想要有所作为,施展抱负。

年轻的陶渊明初仕担任的是江州祭酒,《宋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据史料记载,州祭酒是个很不错的官职,但是陶渊明却“不堪吏职”,觉得当官很无趣,没几天就辞职回家了。显然他不是因经济原因而弃职,当然出仕也不是

为了赚钱。陶渊明选择辞职,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比起匮乏的物资,他注重的是政治理想,精神的追求,江州祭酒这个职位虽然油水不错,却没办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与其在这里为了一点薪水活的浑浑噩噩,不如选择离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后来陶渊明的几次出仕与离职,情形就显得复杂一些了。从他的家庭情况看,子女增加了,生活负担自然加大了。原来比较舒适的生活难以保持,有时遇到灾害收成不丰,对于他这个无雄厚积蓄的家庭难免带来更大压力。所以陶渊明后来的出仕,或者生活追求就离不开经济因素。他多次言及心为形役,孩子众多,应该是实话。特别是最后一次任职彭泽县令就明言为了经济。但是要得到这个俸禄却不得不付出代价,即牺牲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但是污秽的官场与奔波的行役使他疲惫不堪,又精神受到屈辱。这时,早年在家自由自在的生活和魏晋期间盛行的老庄思想对他充满着吸引力:“商歌非吾事,

依依在耦耕。投冠好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者当时由江陵往浔阳休假,假满还江陵,虽然那时他还在当官,但是他认为从政不再是自己的事情,希望按照道家的理想“养真”,将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他在《庾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 中写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诤有儿,纵心复何疑。”诗歌的前两句就表达了自己喜爱园林生活,对人世毫无眷恋,暗含自己辞仕归隐的观点。这些诗歌在表达作者辞仕归隐观点的同时,也流露出作者追求闲适,对平静生活的追求。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晋宋交替之际,社会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许多欲有所为之士常常成为权贵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即使没有牺牲,甚至非常“得意”,那也无正义可言,整个社会只是一群魔鬼在乱舞,自己身处其间不是枉送性命就是为虎作伥。无论如何都不是陶渊明的人格所能


接受的,更不要说实现理想了。他自己深感身处末世,已无实现理想的可能。特别是,他后来做过桓玄与刘裕等人的参军,目睹这些军阀残忍,此时他的生活追求已经不能把物质享受作为前提了,远离是非,保全生命才是第一要务。《论语·卫灵公》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堪,成为一个陶渊明非走不可的理由,孙登曾对嵇康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可见,孙登归隐也是为了去危图安。在这样一个是非不分,众仕归隐的年代,陶渊明也选择了远离是非,激流勇退。他的心思在《饮酒》其六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行止千万端,谁知是与非。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本诗说的是三代以来,人们是非不分,只是顺应时事随声附和。作者表露自己观点,要与世俗背驰,避世隐居。除此之外,作者在《感士不遇赋》中这样写道:“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也表达了贤者避世的人生观。“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这句话描写了陶渊明的失望,不仅看到东晋王朝的衰朽不可复,也预感到了刘宋军阀集团以暴制暴必将灭亡。

那时候的陶渊明,看到了许多名士在仕途上丧命,看到了朝廷的腐败,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功名利禄,光宗耀祖都不那么重要了,活下去才是他的追求。于是他选择了归隐。在他的一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对自己的

劝诫,“千秋万岁之后,谁知荣与辱”“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身后之名也许能够延续生命,使自己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存活,可是若果人死了,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身后之名还有什么用?所以“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从生与死的角度,陶渊明坚定了自己归隐的决定。由此可见,最后陶渊明不得不把自己年轻时候的理想与抱负也丢弃了,在那个乱世能够活下来就很不不容易,还能奢望其他什么吗?这种见识,来源于他自身的经历,也来源于他对史书的阅读。他的许多咏史诗,从三皇五帝到东晋前期历史的回顾与品味,使他明白了今生今世已无可能作为,也不能作为,只能逍遥于田园。

陶渊明早年应该参加过体力劳动的,有些诗作虽然写于晚年,但是很可以看出他与农民们早有的情谊。或许正因为有朴实的劳动人民那里,他依稀看到了一点人生的乐趣,那种没有物质利害关系的淳朴生活,也因此构建了他的“桃花源”,实际建筑了他的田园生活。“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诗的开始就讲出了移居南宅不是出于占卜家宅的原意,而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心地纯朴的邻居,可以和他们唠家常,一起过平淡,安详的生活。简陋的茅屋只要能够遮一床一席就可以了。“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讲述了邻里之间常常串门,热情的谈论着往事,好的诗文一起欣赏。诗中对简陋的生活条件的描写,正是儒家“君子固穷”思想的体现,同时诗中谈到的“抗言谈在昔”可见陶渊明不爱虚谈,要知道当时玄学盛行,许多名士都开始谈论老庄,讨论佛理,甚至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这样形而上的玄学,脱离实际,对于当时国家收复失地,解决民生疾苦没有丝毫用处。当时名士对华而不实的玄学追求与陶渊明的实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他在《庚戌岁九月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这样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中,陶渊明认为衣食是生活的重要条件。这样简单的道理那些稻麦不分的士大夫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与之前刚刚归隐时写的那些关于茅屋草舍,躬耕之乐,志在表达自己归入田园,爱好自然,决定洗尘俗之心相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经成为平常家事,现在的他变得更加的坦然,更加的实际,更好的融入到了田园生活之中。

这种生活虽更多的出现于他隐居之后,但是在他隐居前应该已经萌生了,或者说他出仕前的那种生活是他在步入仕途之后想念的追求的,所以他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官场,抛弃了俸禄,过上清贫却自在的生活,而且矢志不移,成为“隐逸诗人之宗”。

(作者介绍:刘周,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本文指导老师:周海平)